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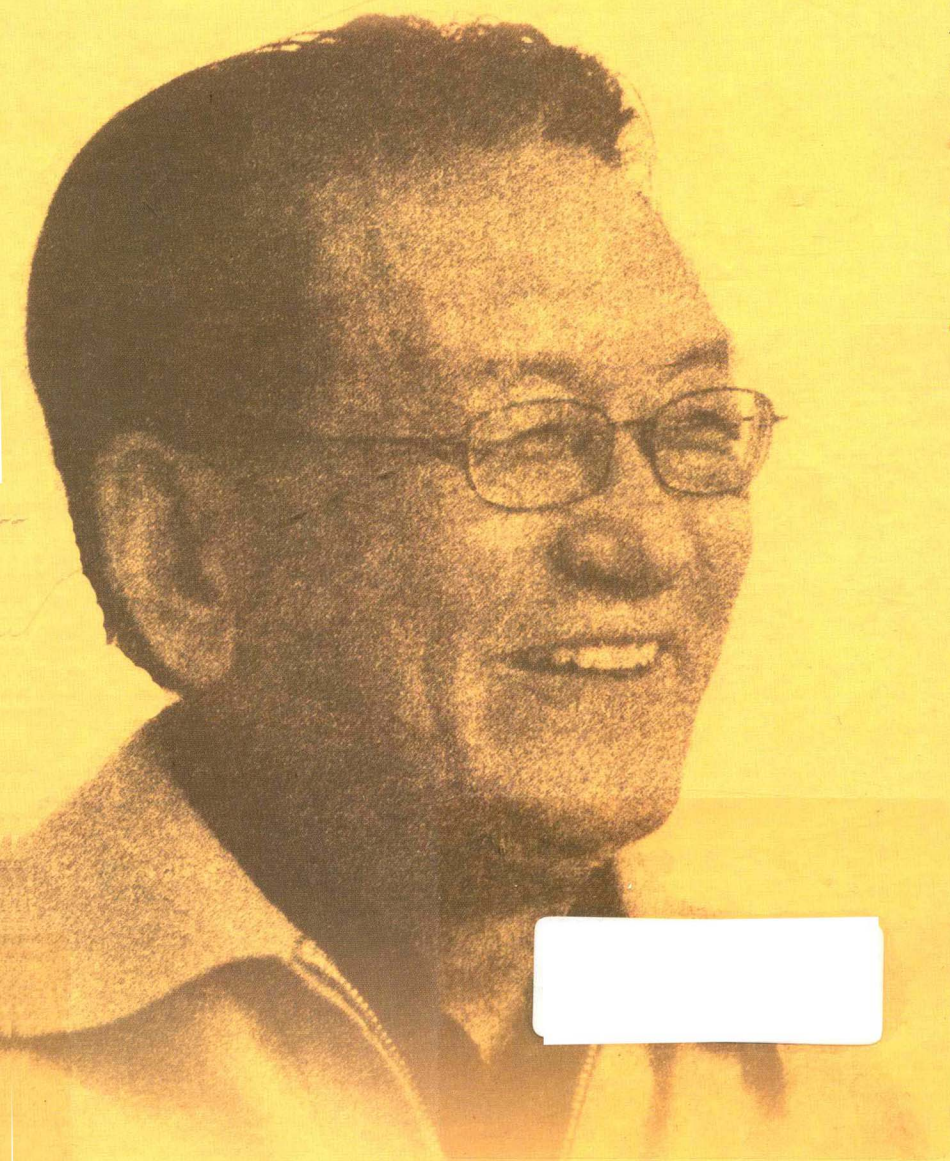
我观党史

石仲泉◎著



济南出版社

一卷



我观党史

石仲泉◎著

● 济南出版社

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观党史：全 3 卷 / 石仲泉著. —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88-0298-3

I. ①我… II. ①石…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理论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5087 号

我观党史 (一卷)

总体策划 王淑铭 丁少伦

特约编审 姜云康

责任编辑 戴梅海

装帧设计 戴梅海

出 版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网 址 www.jnpub.com

电 话 0531-86131726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大 16 开 (210mm×285mm)

印 张 48.25

字 数 9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全三册) 480.00 元

发行电话 0531-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

传 真 0531-8692207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石仲泉，男，1938 年出生，祖籍湖北省红安县。196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 年于该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

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勤于著述。个人专著有：《怎样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等。曾具体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编写和修订。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工作等。负责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研究述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共和国缔造者》画文丛书等。参与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鉴》等。其中，《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曾荣获国家图书奖等奖，《共和国缔造者》画文丛书荣获中国图书奖，《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学习历史决议》等 10 多篇论文获国家级的优秀论文奖。

（本“作者简介”系《我观党史（一集）》于 2001 年 7 月由济南出版社首次出版时所用）

新版的话

《我观党史》在2001年7月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至今10年了。今年，济南出版社将该书和2008年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我观党史二集》，还有这几年写的文章结集一块，以《我观党史》三卷本推出，作为向党的90周年献礼。《我观党史（一卷）》即是10年前的那个本子，《我观党史（二卷）》是2008年《我观党史二集》的本子。这次重新出版时，对两本书中的文字和引文注释作了校勘，订正了个别差错。其他都没有改动，保持了该书的原貌。这两本书反映了个人在10多年前或几年前对一些党史和理论问题的看法，是思想轨迹的实录，供读者研究、评论、指教。

石仲泉

2011年6月

前言

(一) 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保尔·柯察金对此作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回答。他的回答, 曾经激励着像我们这样的 50 年代的年轻人去追求革命的理想, 奉献火热的青春, 也鞭策着我们与时代共进, 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干点事情, 不要虚度年华, 不要碌碌无为。

我始终把保尔的名言作为人生座右铭。虽经历了历史的波澜曲折和岁月的沧桑巨变, 没有能成就什么“显赫”, 但也无怨无悔。因为在那大动乱的年代里没有“弄潮”, 在改革开放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没有“呛水”; 几十年来, 干工作甚为投入, “爬格子”心满意足。生就的这个料, 该干这样的事, 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作为学林中人, 我唯一的遗憾是感到学术生涯短暂。我很羡慕一些大师大家们或 50 年, 或 60 年, 甚至 70 年的学术生命。其实, 鄙人花甲刚过, 按常理言, 不去奢望什么从事学术活动 60 年、70 年, 但 40 年、50 年总是可以的。然而今生无望矣! 因为在北大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 就赶上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迄今 20 年过去了, 已华发满头, 怎么还可能再有 30 年的学术生命呢? 不用说学术生命, 就是自然生命能延寿如此, 那也该谢天谢地了。目前已届退休之龄, 也不恋栈, 只求能有较多的学术研究时间。禄位一长, 忙于应酬, 就很容易忙成碌碌。因此, 在夕阳黄昏龄段要与时间赛跑, 争取使相对的学术生命能延长 10 年、20 年!

(二) 时下有的年轻人强调人生自我设计, 在半个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也难怪, 此一时彼一时, 原因多多。充满幻想, 抱负远大, 不必指责。比如我是学哲学的, 作为北大学子, 当然想在哲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是人生之旅如同历史的走向一样, 是合力作用的结果, 而不是单凭主观意愿就能决定的。因此, 我出了燕园哲学楼阁, 几经辗转, 数十年后, 根植于党史天地。这是当初没想到的, 也从未作过这样的设计。这真有似“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 身老沧州”。但我无陆游那样的经历, 因而也无他那样的沧凉感, 还能随遇而安。

我没有直接从哲学之门跨入党史之家, 其间经过了这样几个过渡性的转换。



第一站是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是1964年中央书记处为了“反修防修”成立的专门研究理论的一个综合性工作部门。我一毕业就到这样的机关，感到受益较大之处，是我开始跳出象牙之塔，接触点实际，了解点政治，有助于拓宽观察视野和思考空间。“文化大革命”十年之久，对国家来说，造成了深重灾难，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这是难以挽回的。但是，对于像从事我们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一点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则是一个缺陷。因此，对有些事要辩证地看，尽量地从所经历的不好的事中得到教益。光是埋怨、咒骂，没有任何用处，要善于使之转化成财富。

第二站是首都钢铁公司。在1969年，我们那个研究院“斗、批、散”后，我被分配到首钢运输部机务段做钳工。就干活来说，很单调，很脏乱，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从家住的颐和园地区到厂里去上班，单程骑车至少100分钟，若碰着风雨雪天则需两个小时以上。这种生活当然苦不堪言。好在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受得了这个苦。到首钢劳动，是这辈子对现代工业、大型工厂和产业工人的唯一一次长时间的体验和考察，从而，按照现在的说法，对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第三站是北京市宣传教育系统。“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对我们这些人也开始落实政策。1973年10月，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即西城区党校当理论教员。差不多一年后，又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在这里工作了五个年头。这一经历使我对宣传理论工作有了一定了解。“四人帮”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理论宣传难搞。在这样的机关工作，杂勤事务极多，如果个人不努力，很容易成为“混混”。

第四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79年初我调至该单位时，这里还叫“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才改为现名。最初是在近代史组，帮助胡绳同志整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这使我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了较多了解。随后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工作，以及负责《历史决议注释本》的工作，则使我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历史受益匪浅，甚至可以说是终身受益。这以后又从事了一段我早就向往的并在北京市委工作时即已开始进行的周恩来研究，了却心灵深处的“情债”和“文债”。那本《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主要是这个时期及其以后的研究成果。1984年开始主持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组工作，直到机构改革时这个组撤销。整整八年，使我有机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历史进行了较多研究。《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主要汇集了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从1991年9月开始，主要精力放在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这一任务直至1994年9月该书出版后才大体结束。这一段工作，除一些组织领导方面的事务外，主要是研究档案文献，撰写所承担的“初拟稿”专题，并负责统改这部分书稿。三年的潜心研究，使我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特别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斗争的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对于后来到党史研究室工作，由在文献室主要从事党史人物研究转向主要从事党史事

件研究，有很大帮助。

第五站就是目前所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也是我工作的终点站了。我是1995年初正式调来这里工作的，实际上在1994年9月西安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讨会期间，就被邀请参加了胡绳同志主持的关于建国后党史编写大纲的讨论。如果说从哲学转到研究党史带有某种偶然性，那么从上述经历，就不难在乍看起来的偶然之中找到其必然性的轨迹了。调到党史室时，胡绳同志交代明确：负责编写建国后的党史本子，再管一下刊物。近六年来，就是干这个工作。前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一书，就包括了这一段结合研究党史所研究的邓小平理论的成果。如果说这些专著多属于牺牲了节假日和晚间娱乐以及双休日而转化成的业余研究作品，那么我和我的同志们最关注、最看重的还是这些年更为呕心沥血而编的党史中卷本子。为了它，翻阅了数不清的材料，开了数不清的会，改了数不清的稿，写了数不清的字，特别是在那集中封闭统改中卷党史稿的108天里，大伙儿真可谓“食不甘味，寝难入眠”。我们是多么盼着它早日面世啊！写建国后党史的那个本子，也许还需要更多的砥砺磨合，不过，可能会感到欣慰的是，已历时四年研讨修改，又经过两年由各个方面的学术前沿专家逐章讨论了两遍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本，相对而言，也许会比较顺利一些。好在主编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由于编辑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和全室上下的鼎力相助，还有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与关心，走在了党史期刊的前列，连续数年被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获“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和“国家期刊奖”。在长期辛劳之后，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慰藉。

（三）我常想，学问中人的生命价值在哪里？过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不是我们这些人的追求。历代志存高远的读书人都崇尚这样一种人生坐标：立功、立德、立言，奉之为“三不朽”。这里姑且不去分析历朝历代宣扬它时曾经赋予的具体内涵，而从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方面来看，还是蛮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我们今人应该借鉴的。不必摆那些豪言壮语，也不必讲那些经过规范了的标准化语言，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究来说，一个很实在、具体的目的，就是：如果立功无机缘，那么立德以正身、立言传后代，是可以自律的。肉身皮囊终要化为灰烬，求索立言则可超越时空。成天“爬格子”，把学问中所思、研究中所获——灵感的火花，认识的新知，转化成书面文字，就是希望著书立说留青史。

“这是要成名成家！”多少年来，这是套在莘莘学子们头上的“紧箍咒”。据说，解放前，对知识分子还少有这样的批评，那么，为什么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成了国家主人，而知识分子又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社会，这样的批评竟盛行几十年，压得一些被批评者喘不过气来，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原因甚多，其中重要一点



是认识的错位。一方面，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泛化了，即把许多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又把本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名成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思想，故在批判之列。其实，在建设了这些年社会主义的中国，真正有大名者、为大家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知名度不是抽象的，是靠它的历史、靠它拥有方方面面的无数大家来支撑的。在一个成天批判“成名成家”、害怕“成名成家”的环境里，能使科学文化飞快发展，那才是咄咄怪事！当然，就知识分子个人而言，应端正思想认识，胸怀祖国，心系人民，不要去计较区区小利。这是一个加强教育的问题，无关宏旨。好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紧箍咒”不那么厉害了，其他方面的条件有很大改善，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有了发挥的空间。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其实，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成名成家”，是一种历史责任感，一种文化传承感。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没有中断，古代诸子百家之说至今仍是研究对象，这与知识分子的参与和点点滴滴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当然，个人想传承和在历史上能否传承，是两回事。个人想传承者如“恒河沙数”，五千年文明则大浪淘沙。但历史似是无情却有情，只要在某个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增添了颗粒者，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四）我从学哲学转而研究党史，经常碰到这样的诘问：利焉，弊焉？从继续研究哲学理论的当年同窗来看，这是由形而上转到了形而下，由距离政治纷争较远的殿堂转到了陷入政治纷争的尘世，因而带贬之口吻者多。但在长期研究党史的同事们眼里，我这个专业转换似成为了一种优势，因而投以褒之目光者较多。我个人的感受是利弊参半。

此话怎讲呢？前已说明，搞党史并非我第一选择，否则，报考北大时就会攻读党史专业。但是，人生之旅至此，则应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扬长补短，营造安身立命之基。平心而论，从研究哲学转而研究党史对我还是有很大帮助的，目前个人在党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主要得益于哲学。比如，研究的宏观视野、理论思考、辩证分析、创新意识等，受过哲学训练者，在这方面就可能沾点便宜。但是，事情总是相反相成，有利必有弊。学哲学者，其长处在于抽象概括的理论思维；其弱点也很明显，如对历史典籍研究少，对具体史实缺乏精确的记忆，叙史多有议论而不善春秋史笔，等等。也就是说，治史的基本功尚欠缺。从治学的根儿上说，这就是非读历史科班生的缺陷。因此，若需“更上一层楼”，“补课”犹为未晚。

研究党史的上述优点和缺点，基本上反映在这本党史文集之中。这本文集汇集了这些年研究党史的主要著述、发言之类。按照论述类别，大体分为六编。

——第一编，属总论类，有九篇文章。一组是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史的论述的一

些认识；另一组是学习江泽民关于党史工作指示信的体会，并将新作《“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一组文章归入此编。

——第二编，为党史理论研究。有七篇文章和学术报告，主要谈对邓小平理论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发展的一些看法。

——第三编，为党史人物研究。有17篇文章，绝大多数是到党史研究室后写的，包括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李立三、胡乔木、胡绳的一些研究。这类文章比较着重这样两点：一是思想比较研究，二是人物关系研究。

——第四编，主要为党史的“史”的专题研究。有大小18篇著述。研究民主革命（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史的，有三篇；属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内容的，有十篇；此外，属跨时期专题的，有五篇。这反映了这些年研究的一个实际情况：重点在社会主义时期。

——第五编，为党史讲话。共23篇。这是这些年具体主持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具体负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一些讲话和报告。这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修订”，有17篇在讨论会上的发言；第二部分为“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写作”，有六篇材料，包括信文、讲话和报告。有的讲话，虽然不完全是党史，但可了解党史本子的修订或写作情况。

最后一编，主要为短评、短论之类。有18篇。绝大部分涉及党史，也有一点个人抒怀。

以上六编，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基本上能反映我目前的党史观。故书名曰：《我观党史》。

（五）搞研究，我很赞赏邓小平倡导的“讲新话”。江泽民总书记不断强调的“创新”精神，也包含这个意思。这是研究人员，包括党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不讲“新话”，没有“创新”精神，那党史研究怎么能前进呢？

应当说，这20多年来，我们党史工作者讲了不少“新话”，因而才有党史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但是对于目前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的党史图书市场又不能不作具体分析。既有可读性很强、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书刊，也有粗制滥造、为许多读者所不屑顾的书刊。

就研究性和纪实性著述来看（这里只论政治导向没有问题，文风严谨，编辑负责的著述），属原创性的，既有一些独特的理论观点，又有翔实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者，难得多见。这多为长期辛劳的笔耕之果，为广大读者所青睐。另一种为编撰性（非指编纂性）著述，在图书市场俯首能拾。这类著述有它的功劳，比如“集大成”呀，“体系化”呀、“通俗性”呀，不可不加区别地一概“棒杀”。既然要加区别，那么就不能不



说一下某些攒得不好的书。这类书多是将原创性著述或市场销路好的作品加以剪裁，然后重新编排组合，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攒出厚厚的一卷本、甚至多卷本著作。由于没有研究，由于缺乏责任，这类书往往错误甚多。作学问，作学者，要想在青史上留点什么，让后人可以咀嚼一下，切不可使自己成为攒书匠。

（六）我自认为搞研究还是投入的，坐得住，能耐寂寞；有钻劲，想说点“新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句话颇富哲理。写文章就是要苦思冥想，找点新视角，讲点新道理，出点新思想，若能抛点新材料，更好。后面这一点不是人皆具备的，对党史研究来说，只有特殊部门、特别人物才有可能。但是，新视角、新道理、新思想，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是应当努力追求的。

常言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不这样认为，我问过的许多人也不这样认为。在党史界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很多；值得我们这些人敬佩的大家，也很多。就我自己而言，虽然写了不少文章，但比较满意的并不多。写文章跟运动员参加比赛一样。运动员只有处于亢奋状态，才出好成绩；只有“打疯了”，才能所向披靡。写文章也只有在高度兴奋状态下，才爆发灵感，出新观点、新思想，犹如“神”相助，笔上生花，既写得快，又写得好。但是，这样一篇文章写下来，很累人，食无味，睡难眠，故“衣带渐宽”。

收入在本书中的《对历史伟人的历史比较》、《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冷峻而伟大的思想者——张闻天》、《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特殊岁月》、《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历史回眸：艰辛与辉煌，经验与启示》和《“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等文，大体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一些年轻同志常问我：你写文章有什么体会，你的那些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答曰：写文章是苦差事，但写好了，苦尽甘来，乐在其中。好文章往往为呕心沥血之作。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只要“呕心沥血”一番，总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获。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不具普遍性，因为我不属于那种才气横溢者，写好文章从来没有那种不费气力的轻松感。

（七）写就的所谓呕心沥血之作，除了开篇布局、起承转合、思想表述、文字润色等用了些心思外，主要是创新意识得到了强化，琢磨了些新观点、新说法，多少能给人点新鲜感。我更看重的是这一方面。比如：

在《“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中，有这么两点是动了些脑筋的。一是在正题下加了个副标题“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谈话’”。这是有意为之。我是很看重“三个代表”这个思想的。文章论述了它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虽然没有展开，但比喻为“南方谈话”，一语双关，其意在不言中。它虽不像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具有突发性的震撼力，但其可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决不可低估。二是试着用“三个代表”思想解读党的80年历史。这是别的文章没有做的。在我看来，党的80年历史可以用下面的“一、二、三、四、五”来加以概括。

所谓“一”，即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宗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艰苦卓绝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所谓“二”，即在80年内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成果；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第二次伟大革命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

所谓“三”，即党的80年历史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要解决的历史主题。第一阶段是民主革命28年，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第二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前期29年。这个阶段的历史主题是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故前8年发展顺利；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故出现了20年的曲折历程。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它的历史主题是继续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故这20多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的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

所谓“四”，即是在80年内犯过四次大的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两次，一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二是30年代前期的“左”倾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次政治运动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巨大损失。

所谓“五”，即是中国共产党80年有五度伟大的辉煌。

一是参与领导大革命的辉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就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国民党合作，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推动大革命斗争在前期获得了巨大胜利。在这次大革命中，首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度辉煌业绩。

二是抗日战争的辉煌。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后，党适时地调整政策，倡导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举国上下的英勇反抗下，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战争的



中流砥柱，而且通过抗日战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三是解放战争的辉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撕毁协议，发动内战。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很快扭转战争初期的困难局面，由防御转为反攻，仅用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解放全中国，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四是新中国头八年的辉煌。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过程中向着社会主义转变，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从总体上看，这场变革还是成功的。

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20 多年的辉煌。经过拨乱反正，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各方面的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三大转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党所经历的时间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这段辉煌还会持续下去。

用上述“一、二、三、四、五”来概括党的 80 年历史，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对于初学者了解党史的 ABC，还是有帮助的。

《对历史伟人的历史比较》一文，主要讲了下面两个观点。

一个是对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比较研究，提出这两者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两个应用发展阶段。所谓“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即同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我不认为邓小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之外，建构了另一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因为他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形成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等都源自毛泽东，没有另搞一套。但是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很大发展，是在应用过程中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故称是“应用发展的又一个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邓小平哲学思想应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果。邓小平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发展显现出的新阶段性，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哲学思想应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第二个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一个历史过程，并非在 150 年前“老祖宗”写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著作之后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老祖宗”们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形态变成了科学形态。毫无疑问，就奠定理论基础和建立思想体系而言，这次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完全科学的。这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事实上，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个别认识、某些认识有这样那样的空想因素、空想成分。从社会主义实践层面来看，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曾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空想论”。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确立科学社会主义100多年后继续犯“空想论”错误，这个历史事实说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因此，党的十三大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要求“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判断”。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否定“空想论”，使对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认识从空想再走向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个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因而，邓小平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路》中，通过胡乔木一些谈话的启示，论述了“政策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中介”观点。

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看，政策既同实践有密切关系，又同理论有密切关系。政策对实践的作用，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讲得非常充分。政策与理论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是否结合的具体体现，反映了能否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凡属正确的政策，在实践中能发挥巨大威力的政策都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又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把握。这样，政策实际上起了理论与实践双向中介的作用。一方面，政策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即理论的具体化或实证化；另一方面，政策也是实践转化为理论的中间环节，即实践经验通过政策得到初步概括，然后进一步升华为抽象的理论形态。

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政策性文献在毛泽东著作中占很大比重。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晶，也是说明毛泽东思想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动例证。由此也有助于回答邓小平著作是否理论著作的疑问。这就要进一步破除单纯从理论的思辨性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定式。因为凡政治理论或政治性很强的理论，都不可能是单纯思辨性的；否则，这种理论就不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不可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像邓小平理论这样的政治理论，就是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方面的大量政策的抽象而产生的。因此，那种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政策而不是理论的看法，是不懂政治理论的实际产生过程，也不懂政治理论的特点。这是可以通过宣传解释来消除的。

在《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党的八大是可以成为两次伟大革命的交会点的，但后来历史的曲折发展，使这个可能性没能变成现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八大与两次伟大革命的关系。

关于八大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关系，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八大处于第一次伟大革命连续 20 年辉煌的鼎盛时期。这个 20 年是从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始的。这以后就经历了前述党的五度辉煌中的三度辉煌，正好 20 年。这 20 年都在进行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工作。八大正值这一革命辉煌的顶峰。

——二是八大前后第一次伟大革命经历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批判个人崇拜、“打破了神化主义”为契机，我们党更可以独立思考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了。这次思想解放，既表现在《论十大关系》等报告之中，也表现在八大召开的全过程和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之中，还表现在八大之后党的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系列讲话，直至 1957 年 2 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之中。

——三是八大前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此期间思想解放的结晶，增添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内容。党对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方位积极探索，使在七大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在考察八大与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关系时，首先要看到八大事实上已提出了现在被称之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那些任务，制定了宏伟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规划。但是，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后来连续发生的“左”的错误，使八大没能成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历史起点。

尽管如此，八大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仍有割不断的联系。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八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这样，八大就自然成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第二，八大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历史参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内容，就是从恢复八大的路线和政策提出来的。《历史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当然，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超越了八大路线。

——第三，由于八大前后对于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经进行了全方位探索，这实际上就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声。这个探索

的实践，反映在理论上则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孕育了思想胚胎，也可以说，八大前后的正确思想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因素。

——第四，八大为第二次伟大革命作了干部方面的历史准备。一是为领导第二次伟大革命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备了核心成员；二是为第二次伟大革命准备了大批高层领导干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多是八大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与会代表，或那个时期的这个方面那个方面的负责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成了推进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中坚力量。

因此，对八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要充分认识。

《历史回眸：艰辛与辉煌，经验与启示》一文，是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50 年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通过反思，提出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的观点。

在我看来，我们党 50 年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既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好的，也有没结合好的。但是，无论结合得好与不好，都构成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这个认识之链，大体有这样几个认识之环：

一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希望以此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二是立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指 1953 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 1956 年基本上完成改造任务，随后也完成了“一五计划”。这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三是制定八大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八大，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初步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八大路线没有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四是重新认定阶级斗争为国内主要矛盾，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经过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随后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认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尽管实行了许多方面的调整，提出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与决策，但这十年间，在理论的总体上基本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三面红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方针。

五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在 1967 年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在党的九大被肯定为照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灯塔”。这是十年内乱期间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



论。

六是提出“抓纲治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在《党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一文中加的一个观点。因为两年徘徊时期不能说没有指导思想。当时提出的“抓纲治国”，实际上就是那两年的指导思想。这个“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①。

七是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际指导理论。尽管邓小平理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一个被正式确立的过程，但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直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将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作这样的链与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认识不采取简单化态度，因为它也是链上之环。事实上，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认识之链上经过包括有错误认识的环而获得的丰硕之果。若抛开错误认识之环，就难以完整地说明这两个认识之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许多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历史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第五编党史讲话。主要是两辑言论。“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修订”一组言论，是这些年研究民主革命党史，主持《上卷》修订稿讨论的一些认识。

比如，在《关于大革命和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的历史定位》的发言中，我认为党当时还是少年。一方面，少年正值英雄时；另一方面，少年又多不成熟。因此，对那时的党不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不要用后来成熟了的标准去衡量它。

讲这番话是说，如果要求1927年的革命就成功，就应该取得1949年的胜利，那是脱离实际的，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对于这个时期的陈独秀，不能苛责。他在大革命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大革命的失败，就作为党的领导者来说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从党创立到这个时期，他一直是总书记，因而是这段历史进程中党的方面的主角。他脱党，参加“托派”，那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事。在大革命时期，应当把他作为正面人物来写。

说是正面人物，并不等于说他什么都正确。正面人物也会犯错误。建国后党的领导人犯有错误，但谁也不怀疑他们是正面人物。这个时期的陈独秀也是如此。那时的党对怎样革命正处于探索过程中，陈独秀也在探索。他犯错误，应当说，是在探索中犯的，因而要把他当成党的领袖犯错误来写。因此，不要再说让陈独秀当总书记是选错了人。在当时只能是他，换了别人，大革命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在这个时候即使没犯大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